

史

著 原 著
注 译 注
审 阅
李 焘
徐 光
安 平
秋 审

·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

GUDAI WENSHI MINGZHU
XUANYI CONGSHU

续资治通鉴
长编选译

巴蜀书社

BA SHU SHU SHE

续资治通鉴长编 译

李 焘 原著

徐光烈 译注

安平秋 审阅

八年·成都

巴蜀书社

责任编辑：范 勇
封面设计：戴 卫
插图：张大川
版面设计：盛寄萍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

续资治通鉴长编选译

徐光烈 译注

巴蜀书社出版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巴蜀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1/32 印张13 插页4 字数170千
1988年8月第一版 1988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670册

ISBN7-80523-098-6/K·33

定价：4.20元

45/12



序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与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协作，辛勤耕耘的结果。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到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人们在正确认实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而要做到这样，对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工程。

但是，整理与研究古籍仅作标点、校勘、注释、辑佚还不够，还要有今译，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基于以上认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组成了以章培恒、马樟根、安平秋三位同志为主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确定了以全国十八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力承担这一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今译任务。在第一次编委会议上，拟定了《凡例》、《编写与审稿要求》、《文稿书写格式》和一百余种书目，以每一种书为十万至十五万字计算，这套丛书大约有一千余万字，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第一批三十六部书稿的译注任务。在各研究所的专家与所长把关的基础上，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和七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召开了部分编委参加的审稿会，通过了二十五部书稿，作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第一批作品。与此同时，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邀请了在京的十几位专家教授与编委会十几位编委一起座谈这套丛书与古籍今译的问题。专家们肯定了今译工作的必要性与深远意义，并以他们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和创作的经验，说明今译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是培养人才，使之打下坚实基本功

的一种有效方法，专家们还对《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对当时的审稿工作和保证《丛书》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证明，古籍的今注不易，今译更难。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两年多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探索古籍的今注、今译的道路上，做了一些工作。这部丛书的出版，是系统今译的开始，说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更可喜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今注今译工作，为古籍整理增添了新生力量，相信他们会在实践中，在学习，中成长成熟。我希望，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和高校各古籍整理研究所要敞开大门，加强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征求他们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并向有真才实学而又适宜做今译工作的专家学者约稿，以提高古籍译注的水平，使《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第二批，第三批作品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套以文史为主的大型的古籍名著今译丛书。考虑到普及的需要，考虑到读者的对象，就每一种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译文力求准确、流畅，为广大读者打通文学关，以求

能读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它。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中小学教师的人文、历史教学的参考书，成为大专院校学生的课外读物，成为广大文史爱好者的良师益友。由于系统的古籍今译工作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也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巴蜀书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我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这套丛书不仅会使八十年代的人们受益，还将使子孙后代受益，它将对祖国的繁荣昌盛起到点滴的作用。最后借此机会向曾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巴蜀书社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殷切地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我们一同做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再放异彩而努力！

周 林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前 言

《续资治通鉴长编》，南宋李焘(1115—1184)撰。今本五百二十卷，是记述北宋九朝史事的编年体史学名著。

李焘字仁甫，一字子真，号巽岩，眉州丹稜（四川丹稜）人。唐朝宗室曹王李偁的后人，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进士。他在四川历任军事推官、知县、知州等地方官多年后，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入朝为兵部郎中，此后历任内外官职，其中以充任主持修史的同修国史、实录院修撰等官的时间为最长。他的一生著述很多，有《易学》、《春秋学》、《南北攻守录》、《四朝史藁》、《历代宰相年表》、《江左方镇年表》、《晋司马氏本支》、《齐梁本支》、《王谢世家》、《唐宰相

谱》、《五代将帅年表》、《陶潜新传》、《诗谱》和《文集》、《奏议》等。在他的著作中，最为著名而影响最大的是《续资治通鉴长编》。

在李焘生活的七十年里，北宋由盛而衰，以至北方的广大地区被金朝占据，南宋偏安江左，只能保持半壁河山。在这种形势下，还在青年时期，他就有志驰驱疆场，报效朝廷，曾著有《反正议》十四篇，追念北宋政权崩溃的教训，提出救亡的主张，也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写出了北宋九朝的编年巨著。他博极群书，尤其精于本朝典故，凭着这种优越的主观条件，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在知成都府双流县的任上，就效法司马光在修《资治通鉴》以前，曾先做《百官公卿表》的办法，编撰了北宋百官公卿表。由于北宋的官制相当紊乱，把北宋的官制沿革和文武官员任免升降的规律梳理清楚，联系当时的政治，也就掌握了北宋一代历史的发展线索，所以，这是李焘编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开始。他借鉴司马光的修史方法，广泛地搜集资料，不厌其多而患其略，宁失之繁而不失之简，把资料加以分析排比，如有不同的说法就两存其说，考证事实，以求其是，并且注明出处。南宋周密《癸亥杂识》谈到他的编撰方法是：做十个木橱，每个橱有抽屉匣二十只，每只抽屉标上甲乙顺

序，凡是当年的事情归入同一只抽屉里，按照月日先后排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是积累和编辑史料的比较科学的方法。

《长编》的取材范围异常广泛。它的主要来源是官修的国史、实录、会要、宝训、编敕、指挥等，如太祖一朝使用的各种官书可以查考的有五百次之多，太宗一朝也有三百三十次以上，至于《长编》正文未曾注明而实际取自官书的还有很多。李焘搜罗了当时所能见到的各种官修史书和官文书、档案等文献资料，象《元祐群臣编类章疏》、《密疏》等都见到了，可以说他所搜集的资料是相当完备的。在引用各种资料的时候，他曾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发现了它们记事有的疏略，有的错乱，有的修撰者甚至凭私意变乱是非，所以在引用的时候，有所选择，有所去取。李焘几乎看到过北宋各朝不同时期修撰的实录，包括当时很难见到的本子，如《太祖实录》曾经前后三次修撰，《长编》太祖朝所引用的实录，可以查考的，曾使用了《新录》五十次，《旧录》四十二次；太宗朝也曾引用了《太宗实录》和《别本实录》或称《实录别本》两种。由于他对官书有深入的研究，因而能够改正不少记载不实的地方。如钱若水所修的《太宗实录》说后汉乾祐三年（950）停止了五日转对之制，宋初

循而未改，太宗淳化二年（991）才恢复旧制；李焘根据太祖新、旧录和本纪，指出太祖朝已经恢复了旧制。类似这种纠正失误的情况还有不少，由此可见，李焘引用官书的态度是非常严肃的。

《长编》还博采野史、家乘、行状、笔记、日记、墓志铭等私家著述。李焘认为私家著述问题很多，在对它们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研究，考辨真伪，弄清真相以后，再决定去取。当官修史书和私家著述矛盾，又没有什么旁证的时候，采用官书而摒弃私著。李焘非常推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涑水纪闻》、《日记》、《朔记》等，但并不是无条件地采用，而是在考订史实之后才决定去取。他对当时史家重视的路振《九国志》、陈恕《十国纪年》等的引用，也是经过慎重选择的。对于私家著述的引用，李焘还特别注重最早的记载，例如他很重视康延泽的《平蜀实录》，因为他是征伐后蜀的重要将领，又是最早的成都府都监。又如他重视汤悦、徐铉等撰写的《江表事迹》，因为他们是南唐的旧臣，熟悉南唐的旧事。有的人品行不好，或是政治、学术观点和李焘相左，李焘在引用私家著述的时候，并不因人废言，仍然引用他们著述中的有用资料。例如宋真宗时的丁谓声名狼藉，但是《丁晋公谈录》（《丁谓谈录》）所记的内容，很多是

当时可靠的事情，因而也加以引用。尤袤撰写《江南野史》，发抒私怨，颇有不实之词，李焘也采用其中可信的资料。甚至经过详细分析以后确认是伪作的《建隆遗事》也有所引用。更为难得的是，他不以个人爱恶来论史，例如他反对王安石变法和王安石的学术，在王安石做宰相期间，曾发生过宋朝和契丹间的边地交涉，有些宋人著作攻击王安石怯懦，主张弃地，而在《长编》中并不采取这种不实的说法。在史实和议论之间，李焘也是尊重史实而忽视议论。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到李焘对待私家著述的态度也是非常严肃的。

注文是《长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正文相呼应，有的注明史料来源，有的注明人物初见年月和邑里、谱系，有的详释并加详正文，有的说明并书、附见史文的主次，还有少数说明写作方法。值得注意的是注文中有不少的史文考异，如考订官私著述的失误、真伪，或考辨人物、事件、时间、空间等，也有相当数量的说明存疑、待考，间或有一些李焘所作的简短评论。正是因为《长编》注文的内容这样的丰富，所以和李焘同时代的著名藏书家尤袤把《长编》注文著录为《长编考异》，把它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并列，清初的四库全书馆臣也说它是“固读史者考证之林也”，从这里也

可以看到它的价值之高。不过，今本《长编》的注文有些是后人附加和清人增补的，这在读《长编》时应该予以注意的。

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李焘奏上太祖朝十七年《长编》，在进书表中说明他尽力史学，尤其欣慕本朝故事，由于当时的学士大夫对本朝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有各自不同的说法，却不去考证可靠的记载，因而他想对这些事件加以研究，得到正确的结论，使各种不同的说法归于一揆。这实际上是向皇帝报告他的写作目的和重要内容，请求予以审查和批准。他的《长编》得到皇帝的认可，并且交付国史日历所。乾道四年（1118），李焘把已报进的太祖朝《长编》补充了一些内容以后，又奏上太祖至英宗五朝《长编》，在进书表中说明他的写作义例完全效法司马光《资治通鉴》的长编法，并且定书名为《续资治通鉴长编》。淳熙元年（1174），奏上神宗和哲宗两朝《长编》。淳熙四年（1177），奏上徽宗和钦宗两朝《长编》。这四次奏上《长编》，前后历时十四年，在这个期间里，李焘从一个四川的地方官成为朝廷主持修史的高级史官，无论所见到的资料范围和工作条件都有了很大的改变，因而发现过去报进的《长编》有史实不确切，体例不一致的地方，所以，在四次奏上《长编》以后，

又进行了一次修订，共修订了四千四百五十多条。淳熙十年（1183），经过修订以后的《长编》，共成书九百八十卷，六百另四册，还有《修焕事总目》十卷，因为《长编》的文字繁多，又写成《举要》六十八卷，《总目》五卷。以上合计一千另六十三卷，六百八十七册。至此，《长编》的撰写工作全部完成。

《长编》奏上以后，宋孝宗就诏令把它藏于秘书省，并且由秘书省依照司马光《资治通鉴》字样缮写一部。由于《长编》卷帙浩繁，传写不易，所以当年的书坊刻本已经有了详略的不同，而且神、哲、徽、钦四朝只是秘书省缮写了一部而未曾镂版，因此，《长编》成书之后，有不同的版本。当时，有藏于秘书省的太祖至钦宗九朝本，有详略不同的太祖至英宗五朝的书坊刻本，还有流传于士大夫之间的抄本。由于《长编》卷帙庞大，传抄翻刻的不易，所以在社会上流传不广。元朝后期，翰林院已经不备《长编》，元朝朝廷虽然下令江南搜求遗书，江南的士大夫之家还是很多顾忌，不肯献书。到了清朝，《长编》传钞本只有一百另八卷，从太祖至英宗，是宋刻清补本，世称撮要本。现在流传的五百二十卷本《长编》，是清朝乾隆年间开《四库全书》馆的时候，馆臣们从《永乐大典》

“宋”字韵下辑出来的，它上起太祖建隆，下迄哲宗元符，共计七朝，和李焘的完整《长编》相比较，除了缺少徽宗和钦宗两朝以外，英宗和神宗两朝又缺少英宗治平四年四月至神宗熙宁三年三月、哲宗元祐八年七月至绍圣四年三月、元符三年二月至十二月。因为原书的《修换事总目》、《举要》和《总目》都早已佚失，四库馆臣又根据辑出的《长编》内容，重新厘定为五百二十卷，并且编入《四库全书》，抄写七部，分别藏在七处藏书阁，世称阁本。后来几经书厄，只有北京文渊阁、沈阳文溯阁和承德文津阁的藏书具存，现在文渊阁藏书在台湾省，文溯阁藏书存在辽宁省图书馆，文津阁藏书存在北京图书馆。此外，清朝嘉庆年间，张金吾根据钱塘何梦华所藏杭州文澜阁《长编》抄本，排字印刷，用张金吾藏书室名称为爱日精庐本，或称活字本。光绪七年（1882），浙江书局又以爱日精庐本为底本，加以校勘后刻印，称为浙江书局本，简称浙局本或局本，也是目前比较常见的版本。

李焘用四十年的时间，撰写《长编》一书，用力专，时间久，故而资料丰富，翔实可靠。例如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以主客郎中、知制诰王曾为契丹国主生辰使，荣州刺史高继勋为副使出

使契丹，回来以后，王曾曾谈到幽州一带的地理形势和沿革，以及当地的风俗人情，《长编》记载得非常详细，这条材料出自宋朝国史契丹传，可以和《文献通考》以及《辽史·地理志》互相印证，而《长编》早出，从此可见它是研究北宋历史不可缺少的史料。虽然《长编》有的地方考订不甚精密，甚至有的互相牴牾，然而以这样大的著作，这种情况是难免的，所以它只不过是白璧微瑕而已，无损于它的史料价值。正是由于它的内容丰富，条理精密，所以问世以后，不仅在士大夫间广为流传，并且不少人取材于它而另写专著。南宋杨仲良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就是以纪事本末体裁，改编《长编》成书。此书收有徽、钦二朝史事，可补今本《长编》之阙，清人黄以周撰《通鉴长编拾补》，又是利用此书以编年体写成。南宋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又名《九朝编年备要》也取材于《长编》。南宋章如愚《群书考索》又名《山堂考索》、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等常引用《长编》，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更有很多内容和它相同。还有大约成书于元初的《宋史全文》，北宋部分的记事也多采用《长编》所述。这些情况也都说明了《长编》的重要史料价值。

《长编》卷帙浩繁，编年系月，按日记事，一

日之中，常多事并见，这是编年史的特点。为了解某一特定历史事件，常需翻阅不少年月日的有关记事，读者苦于检寻，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某一特定历史事件的原委而避免翻检片断零星的记事，所以在忠实于《长编》的基础上，把相关的记事加以集中，拟定标题，以便阅览。如果要了解《长编》关于该特定事件记载的原貌，只要把本书所选译的各历史事件，按照时间先后混合排列，即可见其一斑。本书集中选译了北宋初期部分史实的正文，删除了和所选事件无关的记载，希望通过选译的这个极小部分，反映《长编》的史料价值。由于水平的限制，失误在所难免，希望得到批评指正。

本文采用了裴汝诚、许沛藻同志合著《续资治通鉴长编考略》的研究成果，谨此致谢。

译 者

一九八七年二月